

第一章

文化绵延论作为一种理论学说

宇宙若洪炉，万物生灭若骤若驰，往者过，来者化，斡流旋转，推移变迁，生生不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构成了一个大化流行的生命世界。

在这个世界的生命转换绵续中，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不论是花儿、鸟儿、野兽，都有自我保存、自我绵延的方式与手段：或者借昆虫、风力传授花粉，播撒种子，绵延后代；或者适应环境，变幻颜色，负受天敌灭顶之灾，以保存自己；或者以精巧、高超的技术搭巢造窝，繁衍后代；或者奔走迁徙，于异国他乡寻觅新的生存之地，以便更利于绵延。凡此种种绵延方式与手段，其高明，其精巧，其能干，其创造性，有时连人类也不能不表示惊叹。但是，它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并不能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意义，及在大化流行的宇宙中的地位与历史使命，更不能思考生死、未来及前途、命运一类绵延的价值问题。因此，其生存绵延的方式与手段，仍然是一种本能，而不是一种文化创造，不是意识到的价值思维肯定，或用这种肯定来保护自己的生存与绵延。

人就不同了。这种不同就在于人有自我意识，有意识到的价值思维形式：它不仅能肯定外部世界的存在对自我生命绵延的价值的意义，更能意识到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及生命绵延本

身的价值、意义与使命，并通过这种意识与价值思维肯定创造文化，来保障自我生命及价值的绵延或不断地传递。现在世界各族人民，不论处于何种文化发展阶段，都是通过自己的文化实现一代一代生存绵延的。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绵延方式与手段，同时，它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绵延，即文化绵延。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浩荡不息，绵绵不绝，以巨大的生命精神与价值精神保障着世界各族人民的生存与延续！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问题。动植物学家以极大的兴趣研究动植物的绵延，生物学家也曾从动物到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生物学特征进行过详细的经验实证考察，而物理学家则深入到了从原子到天体宇宙的变化，对其做生命史的解释与说明，而独哲学人文科学家对文化绵延本身拿不出像样的理论研究。虽然也有各种文化史、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关于原始民族文化发展的考察，但这些研究与考察，只是对文化绵延作生物进化论的类比、种族心理学的猜测，或为某种历史哲学作注释，还根本算不上对文化绵延本身的理论研究，或者说，还从来没有把“文化绵延”作为文化哲学中心理论范畴进行研究，更不要说建立一种关于文化绵延的理论学说了。

本书就是从文化哲学上进行这种理论尝试的，即它以文化绵延本身作为文化哲学的特定对象，研究其绵延的形式与发展规律，及其所包含的普遍价值合理性，并通过这种研究建立一种文化绵延的理论或学说。但我并不想把自己的笔触伸到人类文化的各个角落，也不想对世界各族人民文化绵延的合理性进行全面的 research，只想对中国文化的绵延及其所包含的普遍价值合理性，作一个理论上的研究与探讨。因为只有中国文化数千年的绵延最具有这种理论价值：它不仅有绵延的巨大价值内涵，而且其社会历史的深度与广度，也是任何其它民族文化的

绵延无法比拟的。因此，对它进行研究与探讨，对于解决文化绵延中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群体，其文化绵延都不像中国历时这么长，因此他们对文化绵延的研究也无意识与理性的自觉。我们中国学者是自己文化绵延的价值主体，自然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自觉地进行这种理论研究。

要进行这种研究，就不能不对“文化绵延”这一中心概念作一个界定，因为只有作出这种界定，才能区分文化绵延与非文化绵延的界限，才能研究文化绵延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性格，也才能在研究中建立一种文化绵延的理论学说。

（一）文化绵延的性质与奇特现象

什么是文化绵延？它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或本质，以及与生物绵延、文化传播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虽然一开始就涉及到了，但作为理论研究，还是应该从理论范畴概念上弄清楚。

所谓文化绵延，乃是文化依照它的根本性质与价值主体绵绵不绝、生生相续的文化历史过程。这个定义虽然极简单，但要真正理解它，还要作一些解释。

首先，文化绵延是指它的根本性质的绵绵不绝、生生相续。例如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绵延中，虽有变化，虽有发展，但“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它的根本精神，在几千年的绵延中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文化几千年生生相续、绵绵不绝，主要是这种根本性质与精神扎根于国家民族之中，扎根于社会历史之中。文化性质不变，根本精神不变，自然社会历史的根本特性不会改变，

使文化得以绵延。如果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性质变了，根本精神变了，或用另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文化代替了它原来的文化，变成了另一种文化精神，就像古代或近代的殖民化所做的那样，也就不成其为文化绵延了。如果中国文化按照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实现全盘西化，那中国文化自然也就中断绵延了，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性质。文化依它的根本性质而绵延，这就是文化绵延的第一要义。

其次，正因为文化依它的根本性质而绵延，所以文化绵延不是生物绵延，不是种族绵延，而是一种价值绵延，精神绵延，不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与价值精神的绵延。因为文化是价值思维形式，是不同国家民族对外部世界各种事物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这种思维形式作为文化创造或文化意识，一旦在国家民族群体的长期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就会成为国家民族的价值心理与价值观念；特别是对宇宙法则秩序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所创造的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及其宗教伦理道德观念与价值TH神，一旦内化为国家民族意识，在其社会历史的绵延中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例如中国文化中那种“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浩然与天地同流的文化价值精神，贯穿着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绵延了几千年。印度追求“寂静味”的文化价值精神也绵延了几千年。所谓文化绵延，就是这种价值精神的绵延，而不是指某种物质文化的遗留与传递。绵延即生生不息，即创造不已，即价值的连续实现与精神的古今贯通。因此，文化绵延总是表现为国家民族生命精神的绵延与纯价值、纯精神的绵延，前者是他们价值实现在精神上的显现，表现为时代精神的接续；后者则是形而上学本体存在的纯粹思维形式，表现为不同时代对本体的不断观照与领悟。可以说任何国家民族都存在着这两种文化价值精神的绵延形式，不过历时长短不同而已。而且这两种形

式是统一的，因为不论是时代精神还是纯价值、纯精神，都是不同国家民族的生命精神与价值精神，纯价值、纯精神不过是它的纯粹思维形式而已。即使是不同国家民族的物质文化创造，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兵马俑与长城，也无不表现其生命精神与价值精神，或者说透露着这种精神，更不要说他们的哲学、宗教、伦理、道德以及神话、传说、文学、艺术与赞美诗了。但不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产品，文化绵延并不是指它僵死形式上的历史遗存或一代代传递，而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创造的生命精神与价值精神。物质文化，如长城、兵马俑，或精神文化的载体，如古代图书文献，只有当它包含的价值与精神影响到一代代价值创造与精神发展的时候，它才成为文化绵延，因为它已成为价值思维形式的存在，成为价值与精神的存在。文化依其价值与精神而绵延，这就是文化绵延的第二要义。

其三，正因为文化绵延是生息不断，是创造不已，是价值实现的连续过程，是不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与价值精神的绵续，所以，它不是没主体性的，而是依它的价值主体绵绵不绝、生生相续的。这个价值主体就是氏族、部落、国家、民族群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或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要死的，是暂时的存在，是不能完成文化绵延的历史使命的，尽管他可以为这种使命做出贡献。但从整体上看，完成这个使命的只能是氏族、部落、国家、民族群体。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绵绵相续、生生不绝的，才能完成文化绵延或绵续的伟大历史使命。自然，国家民族也有灭亡的时候，特别是不同政权形式的国家，可以说古无不亡之国。但我这里所说的“国家”不是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不是指某个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权而言的，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这正如氏族、部落、民族是指文化意义上的群体一样。正因为国家民族是在文化意

义上的群体，而不是一群血肉之躯，所以它才是价值主体，即它以自己的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创造某种文化，同时也以这种文化的价值、意义进行生存绵延活动。文化绵延正是依照这样的价值主体的生存活动而绵延的。离开它的价值主体，例如国家民族灭亡了，文化价值主体不存在了，或者大部分被消灭了，就像古代巴比伦人、亚述人那样，那么，文化绵延也就停止了。如果一种文化在其它国家民族得到了保存与发展，如犹太教变为西方的基督教，虽然它仍保留有犹太教的一些成分，如崇信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为宇宙唯一的真神，但决不能说西方基督教的创造与发展就是古代犹太人宗教文化的绵延。它只能算是一种文化传播，以及传播所造成的文化影响。如果说是文化绵延，那也是另一种文化的绵延，即西方宗教文化的绵延，而不是东方犹太人宗教文化的绵延。因为不仅文化的价值主体变了，而且文化的根本性质也不同了，它的宗教教义，特别是上帝作为宗教哲学本体论的存在，完全是按照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哲学进行解释的，如“逻各斯”与上帝合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也是属于这种情况。印度国家民族虽未灭亡，但印度佛教发展到 12 世纪末在本国已经灭亡，传入中国以后却得到了发展。但此时它已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中国的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是中国的佛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宗教。因为它的教义已与印度佛教不同，特别是在宗教哲学方面，完全是按照中国道家文化、儒家文化重新解释的。这些佛教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品格的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因此，我们决不能说中国天台、华严、禅宗佛教是印度佛教文化的绵延，而只能说中国文化依照它的价值主体以新的形式进行绵延，或者说是把印度传播过来的佛教文化经过吸收、融和、再创造，以新的特性、新的品格纳入了中国文化绵延的大流。文化以它的价值主体的存在而绵延，这就是文化绵延的第三要义。

最后，文化绵延虽然依一定国家民族的价值主体而生生相续，但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性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时间性概念，即文化历史过程。文化的创造、绵延、生生相续，无疑离不开国家民族生存的空间，否则文化的价值与精神就无根底，就无处着落。但只有空间而没有时间，即过去、现在、将来的持续发展，也就没有历史的持续性、文化的持续性，也就根本谈不上文化绵延问题。这样，文化绵延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文化绵延没有时间的持续性，只是空间性的存在，那也就把文化绵延变成文化堆积了，就像家具、物件堆积在某一空间一样。这样也就看不出变易，看不出发展，也看不出绵延了。因为它把无限时间的持续绵延都集中到“此在”或“现在”这个空间点上，也就把文化绵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给抹掉了。试想，如果中国文化抹掉五千年时间上的持续性，还有中国文化的绵延吗？自然，作为形而上的纯精神、纯价值的绵延，它的抽象无疑要抹去或淡化掉一切具体的存在，无疑要把过去、现在、未来一些具体的文化价值与精神的存在都抹去，或淡化掉、抽象掉，把它变为纯粹的价值、纯粹的精神，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参万岁而一成纯”^①。但这不等于说抽象出来本体存在的纯价值、纯精神就是纯粹空间的此在或现在，不需要经历时间的持续了。不是的。在中国文化看来，道虽是形而上的存在，虽然是超越性的存在，但它的存在，它的精神的存在，又是离不开具体历史时代的。这也就是说，纯价值、纯精神的超越性存在与绵延，还是离不开具体时间、空间文化价值与精神的存在和绵延的，或者说纯粹时间、纯粹空间的价值与精神，依然存在于具体文化绵延的时空变化与持续性之中。只有这样，文化绵延才能成为价值的绵延，精神的绵延，而不是

^① 《庄子·齐物论》

把纯价值、纯精神的存在停留在空中某个点上，或者把它变成彼岸世界不变的存在。西方除了个别哲学家，从古代希腊时就不把“时间”的存在看得那么重要。他们总是把时间系统纳入空间系统，把古往今来的时间持续性变成一个空间性的现在或此在。正如几何学或现代物理学把宇宙万物在时间上的发展变化都变成一个空间的几何图形或原子结构模型一样。由于他们忽视了时间的变化，所以也就把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变成了空间某一点的存在。这种观念转移到文化上，就是缺乏文化绵延的意识与自觉。即使是西方近代科学家意识到了时间的存在，但这“时间”不过是空间结构的延续，或者说是空间某一点过去、现在、未来的演化，就像几何学上的点的移动延伸成为线一样。这种观念转移到历史哲学上，就是直线进化论。西方哲学家虽然自黑格尔特别是柏格森、怀特海以来，对时间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但就“时间”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历史意识来看，西方国家和民族并不像中国民族那样看重时间。不论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还是《易传》讲原始察终以为质，知化通变以趣时，都是非常重视时间的持续性的，都是把时间的变化看成是无始无终、轮转无穷的。所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①，“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刚柔者，立本者也；通变者，趣时者也”^②等等，就是这样一些时间观念。这种观念转移到文化持续性上，就是文化绵延意识的自觉。这也是中国人看重自己文化历史的原因所在。有了这种自觉性，也就把文化绵延变成了一种意识到的价值与精神的持续，变成了意识到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的绵延。只有这种绵延才是最有价值的，才能在文化

① 《周易·系辞上传》

② 《周易·系辞下传》

绵延的理论研究上对价值问题进行处理。对一种没有意识到的文化绵延，是很难进行价值问题处理的，因为文化的价值是一个意识到的价值思维判断问题。文化绵延也是这样。总之，文化依时间而绵延，依时间的持续性而绵延，依对时间持续的意识而变成有价值的绵延；离开了时间，离开了时间的持续性，也就不成其为绵延，也就构不成文化绵延。这就是文化绵延的第四要义。

综上所述，文化依它的根本性质而绵延，依它的价值主体而绵延，依它在空间上的存在发展与时间上的持续性而绵延，并且是一种价值与精神的绵延，这就是我对“文化绵延”概念定义的全部解释与说明。只有理解认识了文化绵延的性质或本质，我们才能对文化绵延作价值论的研究。因为这个定义不仅区分了文化绵延与非文化绵延的界限，如生物绵延或种族绵延，而且它还揭示了与文化传播的不同性质，揭示了它的一种根本价值与精神绵延的本质，从而使我们对文化绵延的性质能够从理论上进行把握。

如果我们依照文化绵延的这种性质或本质去观察人类文化史，那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民族文化现象，即世界各古老文明民族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或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以及位于地中海的古腓尼基文化等等，在历史的发展中，都衰亡了、中断了或转移了，唯独只有中国的古老文化，上自伏羲、炎、黄、唐虞及夏、商、周三代，下至唐、宋、元、明、清以至今日，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绵延了五千余年乃至七千年，而且由始至终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不像其它古老民族的文化，山河依旧，风景不殊，文化已经失散，主体已经易人。现在的埃及文化，除了金字塔、木乃伊等一些遗迹，占主导地位的已不是古埃及文化，而是伊斯兰教文化。人也不是原来的古埃及人，而是阿

拉伯人。古代希腊人也不知哪儿去了，文化也转移了，先是罗马，然后是经海上传到欧洲大陆。其它像巴比伦文化、亚述文化等等，也都随着战争及民族的迁徙与融合，衰亡了，消失了。能够与中国文化相比较的，只有印度文化。但印度文化及其主体的存在，也发生过很大变化。最初创造发展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的，是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但公元前 2000 年雅利安人入侵之后，原来的古代印度文化也就渐渐日尔曼化了。后来的《吠陀》经典所体现的印度文化，很多都是入侵的雅利安人与印度原来的达罗毗荼人融合以后所创造的新文化。雅利安人是欧洲白种人，语言属日尔曼族语系。因此，印度吠陀时代的文化，从本质上讲，可以称作印度日尔曼文化。它已不是古代的印度文化，而是日尔曼化了的古代印度文化。不仅文化的性质变了，文化的主体也变了。而中国的古代文化，虽然也融合了其它民族的文化，但从上古到现代，文化的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文化的主体始终是以华夏诸族为主干的中华民族。印度文化还有一点与中国不同，那就是由于印度文化追求宗教不生不化、寂静常住的世界，因此，印度人作为文化的主体，不像中国民族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他们的文化历史虽然很长久，但由于缺乏历史意识而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种长久文化历史的存在。失去历史意识，也就失去了时间持续性的观念，也就把文化在时间上的持续绵延变成了单纯空间上的此在或现在，也就没有了文化绵延意识。这和西方没有时间观念是一样的。这种没有意识到的文化绵延，在研究上也是很难作价值问题处理的。这与中国民族意识到的文化绵延也是不可相比的，因为中国人是始终自觉意识到自己文化历史的民族。这自然在文化哲学上有不同的理论价值。

（二）文化绵延的理论性格

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与绵延，都有它存在与绵延的理由和根据，不然它就不能存在绵延下去。特别是中国文化上下绵延五千年乃至七千年，没有它的存在与绵延的理由和根据，无论如何是不能绵延如此长久时间的。可以说，中华民族凭着自己的文化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绵延五千余年甚至七千余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学问、大哲学、大理论。如果中华民族没有自己强大的哲学，没有自己生生不息、绵延后世的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与深厚博大的人生哲学，而只是贪图小利或根据浅薄物在而行动的蝼蚁之辈，她是决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绵延五千余年乃至七千余年的。因为这块黄土地带给她的不仅是美丽、富饶，还有贫穷、苦难、战争和杀戮。她有一百个理由像世界其它民族一样不断地迁徙，寻找自己新的生存之地，或者按照另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换一个活法。但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在这块土地上继续生存着、绵延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人生哲学虽然也有发展，也有变化，但是她的根本观念与哲学思想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虽然也有过较大的迁徙，如西晋末年、唐朝末年与北宋末年三次向南方迁徙的浪潮。但这种迁徙只是在自己国土上流动，只是转移文化中心，并没有像其它国家民族那样完全放弃自己的生存之地与文化，或者这块土地完全由另外的民族和文化所代替。中华民族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绵延五千余年乃至七千余年，就在于她有自己生生不息、绵延后世的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与深厚博大的人生哲学。这

种哲学与理论根据，在文化上就是它的生命精神与价值精神，就是它的理论性格。性格即价值，即本质，即特性，即风格，即理论上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只有研究了中国文化绵延的理论性格，才能对它的绵延的各个方面作理论上的说明，也才能建立一种文化绵延的理论学说。

那么，中国文化绵延具有怎么样的理论性格呢？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理解中国文化绵延的理论性格呢？这种理论性格无疑是全面的、系统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国文化绵延的根本性质上去讲，它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即形而上的大道本体论与价值论性格；广大悉备的知识论性格；以及中华民族作为文化主体高度理性自觉的实践性格。

首先让我们研究一下中国文化绵延的形上大道本体论与价值论性格。如果我们研究文化史就会发现，任何文明民族的文化绵延，都存在着某种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总是和形而上的价值本体联系着，特别是在宗教、哲学、伦理、道德一类精神文化领域，这类联系更为明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如果没有形上本体论、价值论存在作支撑，其精神必然低下，也不会因强有力而持久；反之，其形上本体论、价值论存在愈博大、愈悠远、愈高明、愈超越物的实在，其价值与精神也就愈纯粹、愈强大、愈有力量、愈绵延不绝。中国文化的绵延正是这样。它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所以能够长久不衰、绵延不绝，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有形上大道本体论、价值论存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与绵续，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大道本体的存在。它既是宇宙万物生生化化的本体，又是中华民族价值与精神的源头。中华民族的信仰和信念，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以及与天地参，与万物并，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解天下之惑的理念，无不和这个本体论、价值论的存在联系

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本体论与价值论的性格，很难设想它能绵延几千年之久。因为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信仰与信念的民族，是很难维系的。而这种理想、信仰和信念，并不是来源于具体的物质实在，或发端于物欲的追求与感官的刺激，而是基于宇宙万物法则秩序的某种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在西方文化中是“逻各斯”与上帝，在印度文化中是“梵”或梵天大神，在中国文化中则是“道”或大道本体。它的名称虽然不一样，但在原始发生的意义上，无不是对宇宙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它一旦被抽象出来，并作为价值思维形式被肯定下来，作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中形上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存在，也就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精神，构成了不同国家的民族魂，并在国家民族的绵延中成为他们价值理想、信仰、信念以及伦理、道德一类精神的支柱^①。没有这种精神支柱，国家民族的神圣大厦就会坍塌，斑斓的文化花园就会变成断井颓垣，自然也就谈不上绵延了。中国文化所以绵延几千年，全在于它在发展绵延的历史过程中保持了大道本体论、价值论的性格，并且在形而上的高度，把它变成了纯价值、纯精神的存在。中国文化的绵延，实际上也就是这种纯价值、纯精神的绵延。尽管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改变其思维形式（如宋明理学家以“理”的思维形式代替“道”）并表现为不同的精神形态，但它的形上大道本体论、价值论性格，及其作为纯价值、纯精神绵延的本质，则在几千年的文化绵延中从来没有改变或中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的群体，在文化哲学上从来没有改变过它的大道本体论与价值论的性格及其价值体

关于中国形而上学的大道本体是怎样从宇宙万物的法则秩序中抽象出来并成为民族精神或民族魂的，请参看《文化价值哲学》第四卷《大道运行论》第一章

系，最多只是把它推向前进，用新的内涵去解释它、说明它，而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今天以这个为本体，明天以那个为本体，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可以提出一种本体论的学说，都可以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价值体系。中国文化所以强大，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就在于它有形上本体论、价值论上的统一性、坚定性。去掉了这种统一性、坚定性，中华民族随便改信一种哲学，改信一种理论，那么，其文化或文明的价值体系也就不存在了，也就说不上绵延了。因此，讲中国文化绵延的理论性格，首先必须强调这种形上大道本体论、价值论性格，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追求虚无缥缈的民族，也不是一个靠幻想或虚假的假设过日子的民族，而是一个经世致用、开物成务、道济天下的民族。因此，他们不仅追求宇宙的普遍法则秩序及由此抽象升腾出来的形而上学的大道本体及其纯粹的价值、纯粹的精神，更是格物致知、追求经世致用之道。这里所谓致知，所谓致用之道，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知识论问题。但这种知识，并不只是西方关于物的知识，或纯粹的自然知识，而是合天、地、人与精、气、神，广大悉备而言之。故在文化绵延上表现为广大悉备的知识论性格。

这种知识论性格不仅要具备知天、知地、知万物的普遍法则，而且要能认识理解人心、人性及整个人类精神世界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这也就是《易传》讲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本而两之”^①。用今天的话说，它不仅追求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追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宗教、哲学、道德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割裂的、孤零零存在的。

① 《周易·系辞下传》

它从观察天地万物的阴阳化育开始，把一切阳抱阴合、化育万物的法则归纳为一阴一阳之道，归结为阴阳化育的生存之理与绵延之理。因此，其为知识，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这个知识虽然包括物的知识，但却是一个广大悉备的知识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个“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民族，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思维停留在物的知识上，停留在浅薄的知识论上，而是把它继续不断地向上提高、升腾、超拔，抽象为“有”的存在，抽象为“无”的存在，抽象为纯一的存在，抽象为无极太极的存在，一句话，抽象成了形上大道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存在。其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变化莫测之谓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谓至神。不论怎样看待这个形而上学的大道本体存在，其实它都是中华民族及其先哲囊括宇宙万物所获得的知识，是把这些知识消融于一个道体大全的世界所获得的无上真理性。它消融了一切局部经验、知识、观点的差别及其局限性，把一切时空范畴及个人相对的经验知识都纳入了一个无偏无颇、广大悉备、道体大全的无穷知识体系。至此，才是至知圣知，才是最高的知识，才是涵盖一切的知识，才是广大悉备的知识体系。所谓广大悉备的知识论性格，就是这样一个涵盖一切知识的体系，一个道体大全的无穷知识系统。它是知识论的，又是本体论与价值论的，是消融了一切具体的知识在形而上的本体论高度所获得的纯知识、纯法则、纯价值、纯理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能解释宇宙万物的生生化化，才能解释人心、人性及整个精神世界的现象，包括宗教信仰及至善至美的道德问题。

但是，不管把这种知识提升得多高、多抽象、多纯粹，它依然是知识，依然是法则，依然是知识与法则的思维形式，而

① 《周易·系辞上传》

不是西方文化的上帝或印度文化梵天大神一类神秘的精神实体，或彼岸世界与人类万物相隔绝的存在。正是因为这样，它才可以向下落实，才可以还原为开物成务、经世致用、道济天下的知识。《易传》所说圣人神明其德，“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①，就是讲的知识还原及向下落实。不论是西方文化的上帝，还是印度文化的梵天大神，它都是不能还原为具体的日用知识的。它只能停留在彼岸世界，或在梦幻中出现，要它变为日用的知识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中国的大道本体存在则不是这样。它虽然是从具体知识中抽象出来的，是纯粹的思维形式，但就道体流行、显诸大用来说，它又是不离形器的，是可还原为日用知识的。

从观察阴阳化育的自然现象开始，提升为形上大道本体存在，然后再把它还原落实为开物成务、经世致用的具体知识。中国文化就是这样把知识论与形上本体论、价值论统一在一起了。这也就是说，它把科学经验与宗教经验、伦理道德经验与形上价值判断，在广大悉备的知识论上取得统一与一致。这在西方文化和哲学的观点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它认为，科学是经验实在的知识，是可以用实验实证的，而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如上帝一类精神实体，则纯属价值判断问题，是根本不能用经验实证的。然而这个西方文化和哲学所没法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化和哲学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中国文化这种广大悉备的知识论性格，以西方现代知识论哲学或科学哲学的观点来看，也许是不利于科学知识发展的。然而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看，正是因为它解决了知识论与本体论、价值论相割裂的问题，解决了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科学发展与宗教信仰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的

① 《周易·系辞上传》

问题，实行天人合一、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合一、厚生利用与正德合一，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把它们相互割裂、相互对立起来，各设疆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绵延中才没有产生西方近代以来的信仰危机、精神危机，也才没有产生西方科学发展对自然界生杀掠夺的破坏；相反，正是因为它有广大悉备的知识论作基础，才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解天下之惑，才能知性知天，诚之于心而不惑，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人无弃人，物无废物，参赞天地万物化育，以成盛德之业；才能开物成务，道济天下，显诸仁，藏诸用，生生不息，日日新又日日新，成为一代又一代富有盛德之大业。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绵延，岂不全赖有此广大悉备的知识论性格吗？知识上的割裂，必然造成价值的割裂、人生的割裂，进而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割裂和历史的断绝。如果中国文化哲学实行知识论与本体论、价值论的分离，实行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使广大悉备的知识体系成为各设疆界的孤零零的知识，或知识的片断，那么，至诚不息、深厚博大、高明悠远的中华民族，也就变成了浅薄的一群，或孤立断绝的存在者了，其深厚、博大、悠久的历史，也就会因其浅薄而不能经久不息地绵延了。由此也就可知广大悉备的知识论性格对于中国文化绵延的重要了。

文化绵延之历时长短，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实践问题。文化实践究竟是理性的、自觉的，还是非理性的、盲目的，对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绵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涉及到文化绵延的理性实践性格问题。

我所说的理性实践性格，乃是指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凭着良知、凭着灵明之心或虚灵不昧之心，不断地观照、领悟道体的存在，并理性自觉地把它归复还原为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过程，或者说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化绵延